

历史功罪向谁论

——《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》读后

陈铁健

应当拂去的历史阴影

这是一本不足 15 万字的著作,卷首有几帧书中主要人物罗章龙以及他在 1936 年拍摄的游览华山、青岛的照片和晚年所写诗文的手迹。其中一首七绝诗云:“骊山兵谏建功勋,亘古男儿忆汝名,渤海洞庭波浪阔,历史功罪向谁论?”他的一纸手迹慨叹:“西安事变幕后人物外间知者甚少。”另一人物李希逸 1992 年从美国寄给罗章龙的小小名片不无深意地写着:“1936 年西安一别,已近一个甲子。每忆故人,不胜怅惘。尊况偶由报章获悉。旧日同侣,殆仅存兄与弟二人。”(无文:《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》,香港银河出版社 2000 年版。)

汝名、渤海、李希逸等“旧日同侣”何许人也?西安事变“幕后人物”又何所指呢?罗章龙、吴雨铭等前共产党人留下的狱中供词和回忆文字,都不约而同地回避着自己在张学良身边策动兵变的壮举,或者一笔带过:“以后就在张学良的左右工作”(吴雨铭供述),或者语焉不详:“我曾到东北军工作”(曹策回忆录),就是境遇较好的罗章龙,“留下的文字或者藏头,难窥全豹,或是暗语符号,难辨真相。所有的文字和心灵都罩着一层抹不去的阴影”(本书第 116 页)。罗章龙在“文革”前写过一些回忆中共内部斗争的文字,

但被当权者警告不准深谈。“文革”开场不久即被抄家,许多资料散失。其后所写文字,不得不加以“包装”,或故意空行漏字,隐语曲笔,或避而不谈,掩去真相,或闪烁其词,前后不一,使后人难窥决策的内幕和行动的细节。

这一批老共产党人,或因被捕转向,或被中共开除,聚集于东北军总部机关,成为罗章龙所说的“西安事变幕后人物”。在当年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生死搏斗的险恶环境中,这些人不容于赤白两道,因而组织严密深藏,行动不留痕迹。若想还原其历史真相,实在是太难了。

为了拂去层层阴影,追寻坠绪,透视幽渺,本书作者历经数载,钩玄探微,小心求证。许多问题虽然一时难以完全廓清未必即是定论,却为史学界今后深入探究这些问题,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和饶有新意的思路,也为一般读者安排了一个想像的空间。

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

1934年前后,前共产党人在东北军中结成的秘密组织,究竟由何人组成?这些人又如何从中共分离出来?这要从3年前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说起。

1931年1月7日,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(后台是掌握共产国际和苏联党政大权的斯大林),以突然袭击方式,强行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,打击瞿秋白等,扶植王明集团夺得中央领导权,结果引发大规模党内斗争。大批抵制四中全会的党员干部拒绝承认新的中央领导,其中包括罗章龙、何孟雄、林育南、李求实、韩麟符、吴雨铭等。双方的矛盾激化,罗章龙等几十名反对派骨干被米夫以“分裂党”的罪名宣布开除党籍。罗章龙、史文彬、何孟雄、李求实等成立“中央非常委员会”(以下简称“非委”),予以抗

争。上海“非委”领导成员有何孟雄、林育南、李求实等，北方“非委”主要骨干有王仲一、韩麟符、吴雨铭、张慕陶、李希逸等。早年从中共转向，投身于奉系张学良的黎天才，也成为北方“非委”的特殊成员。四中全会召开10天后，1月17日上海突然发生“东方饭店事件”，何孟雄、林育南、李求实等人陆续遭国民党当局逮捕。“非委”的活动中心被迫移往北方。2月7日，在上海被捕的24人被枪杀于龙华。2月10日起，王仲一、韩麟符、吴雨铭、张慕陶、李希逸等在天津先后被捕。王明集团逐步在全党推行极左路线，把中共推向濒临灭亡的边缘。

“非委”遭如此沉重打击，活动似乎早已结束，实则不然。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后向张闻天、毛泽东、彭德怀发出的电报即说，张学良“言他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义的人，其中有几个共产党人（脱离党的叛徒）”。引起周恩来注意的这几个共产党人，显然是指在张学良身边任职的“非委”核心成员黎天才、吴雨铭、李希逸等。

黎天才，又名渤海、伯海、经天。山东蓬莱人。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，策动京汉路大罢工的骨干分子。加入中共后在铁路总工会与罗章龙、吴雨铭等共事，先后参予工运、学运、兵运工作。李大钊死难后，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。1928年被捕转向，投靠奉系，张学良倚为心腹，初长总部机要处，旋为总部政训处核心人物。后为东北军“非委”秘密组织领导人，是坚决支持张学良发动兵变的人，西安事变张杨八项政治主张通电的起草者，主持事变的宣传工作。

吴雨铭，又名汝明、汝名、雨名、慰名，与罗章龙同乡、同学，同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者。从事工运工作，为罗章龙的助手。大革命期间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，中共“五大”中央委员，全国总工会秘书长。北方“非委”书记兼铁路总

工会“非委”书记。被捕后转向,通过黎天才进入东北军,成为东北军“非委”秘密组织的核心成员,张学良总部机要秘书。

李希逸,又名玉书、秋生。河北静海人。北京大学学生,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。曾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、天津市委负责人。“非委”成立后任北方区委委员、天津市委书记。1931年在天津被捕转向。1933年张学良下野离北京前下令释放共产党政治犯,交黎天才经办。李出狱后入孙殿英军中任政训处宣传科长,为学兵队讲授马列主义常识。一年后孙军兵败宁夏,李希逸转入东北军,为“非委”秘密组织核心成员。

张学良何以肯容纳共产党政治犯呢?

早在1931年2月10日,张学良对日本记者谈东北时局时说共产党里“有研究学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”(《张学良文集》(1),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,第436页)。恰巧此时“非委”北方组织在天津遭破坏,吴雨铭、李希逸等被张部逮捕在案。张学良对共产党人的取缔方针,只限于取缔“暴动分子”,而对“研究学者”型的共产党人则似乎明显宽容。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主办被捕共产党人案件的便利,使被捕党人尽快出狱,又逐步吸收他们进入东北军总部机要部门,进而成为张学良的智囊人物,受到器重。据罗章龙晚年回忆,先后进入东北军的共产党人约20余人。东北军“非委”组织的黎天才、吴雨铭、李希逸为核心,秘密接受在河南大学(开封)任教的罗章龙的领导,“处处照顾到我党在当时的政策”(据《黎天才自传》未刊稿),继续从事政治斗争。

或许有人会问:东北军“非委”成员的活动是否算作组织行为?其实,一切非法秘密组织的地下斗争,不可避免地带有密谋性质,多半是先有人员、有行动,才有正式的组织形式,再经上级组织认可。在特殊环境下的非常行动,很难讲求正常条件下规范的组织程序。“非委”成员既然不容于赤白双方,其密谋性质更为明显,更

没有必要将人员登记造册,确立组织名称,否则一旦暴露,其后果不堪设想。“非委”进入东北军的成员,都经历过中共党内和北方“非委”组织生活的约束,多年来目标一致,高度默契,严守秘密,相互配合,形成有力的群体行动。这样的群体,当与政治组织无异。

张学良研习共产党学说的三位伴读

张学良于1934年1月8日由欧洲返国抵达上海,发表谈话拥戴蒋介石为最高领袖,倡言仿效德、意法西斯,实行领袖独裁,武力统一中国。2月,张出任豫鄂皖三省“剿匪”总部副总司令,翌年3月改任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。张虽追随蒋介石“剿共”,却又担心内战招致日本加剧侵华,亟欲抗日而不可得,深陷愁城。为谋求出路,寻觅人才,张学良将目光转向共产党,潜心研习共产主义学说。在百忙之中,张学良经常要伴读者随车为他讲解。

为张学良随车辅导共产主义学说基本知识的前共产党人,首先应该说到潘文郁(又名问友、闻友、冬舟、东周)。潘是湖南人,中共早期党员,留苏学生。回国后任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秘书,编辑《布尔什维克》,被向忠发倚为“文胆”,署名向的文章多出自潘的手笔。20年代末30年代初,参加反文化“围剿”斗争。在《世界月刊》、《新思潮》等刊物发表的6篇万言长文,论题涉及中国经济性质、经济发展、经济改造、中国工业、对外贸易等,几乎涵盖中国宏观经济领域。1931年,潘文郁被捕自首,被中共明令开除党籍。此时恰逢老友黎天才。经黎安排,潘住进北平城东一所公寓,主持《北方公论》周刊,宣传抗日,并为张学良之不抵抗行径辩护。黎设法出版潘文郁接续陈启修所译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二分册(第二、三篇)、第三分册(第四篇)。黎潘之交深厚,相顾相惜,潘得黎引进,遂入东北军。与此同时,中共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将潘“拉出

来”为中共做东北军的情报工作。1934年秋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杨青林案牵出潘文郁,并缴获大量证据。张学良仍欲保护潘,卒在蒋介石一再严令之下,被迫将潘处决。潘临刑前夕写数万言遗书,交张后从容就死。张学良以重金抚恤潘妻及两子,不无痛惜之情。

黎、潘在张学良幕中,虽彼此心照,但终未捅破各自的组织关系。本书说得好:黎潘“既有惺惺惜惺惺的相知,又有各为其主的心计”。他们互相利用,绝不露出各自的组织底细。“一黎一潘,真格的殊途同归,把对蒋介石已灰心的张学良推上了‘革命道路’”(见本书第64页)。潘死后,北方特科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已前功尽弃,黎天才等都始终按照“非委”的路数,在策划着东北军的行动。

继潘文郁之后,黎天才按时随车为张讲书。不久,吴雨铭成为张学良研习马列学说的伴读。吴是中共早期开辟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,他的讲解使张学良更加真切了解中共早期历史和工运工作业绩。

下边是张魁堂著《张学良传》中对三位伴读情形的描述:

自1934年起,张学良在潘文郁、黎天才的帮助下,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,如辩证唯物主义、布哈林的《共产主义ABC》、列宁的《左倾幼稚病》、《资本论》等,还要潘、黎经常给他讲解。他住在武昌徐家棚,办公在望山门原湖广总督衙门,每天乘车前往,每次要40多分钟。张常要黎随车给他讲课,盛夏挥汗如雨,也不停止。潘案发生后,张带潘、黎去南京开会,住在蒋介石的陵园别墅,只10来天,张请潘讲国际共产党历史,共讲了三四次,每次都在一小时以上。熊谷康是张学良在武昌结识的日本朋友,熊谷说张“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”。

潘案未了结前,张学良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已有初步的了解,对阶级斗争与工人运动实践更有兴趣。说黎天才的讲

解是洋秀才上课,要黎找一位办过工运与工人共同生活过的人为他讲工运和阶级斗争。黎找来了吴雨铭。(《张学良传》,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,第119—120页)

1935年中共红军长征落脚于陕北,蒋介石数次与张学良商讨,令张主持西北“剿共”军事。据《黎天才自传》叙述:

张曾考虑至再,我当时坚决主张接受这个命令,我主张的出发点,有些英雄主义的出发点,认为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,是待开发的处女地,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,分治割据,同时也可以接近我党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力,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。

他(张学良)那时读了一篇陈绍禹同志写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,口诵心唯,逢人便说……他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,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,都由我写具体方案,他并对我表示要请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,以讲学为名,实际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政治工作,记得当时我曾推荐了罗章龙等人。

显然,张学良已将学习马列主义融入了他的政治实践中。

张学良与罗章龙秘密会晤

西安事变前,张学良与“非委”最高领导人罗章龙数次会晤。时间从1935年春到1936年秋。

罗章龙(又名璩阶、仲言、文虎),湖南浏阳人。北京大学学生,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及中共北京小组发起人之一,中共三至六届中央委员,工人运动的领导者。1931年1月,罗章龙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出党,愤而组织“中央非常委员会”与王明集团的新中央抗衡失败,无法在上海立足,遂转入北方,在奉系天地里隐匿两

年。1933年重返上海,旋即被捕。幸得蔡元培等出面营救获释,北赴开封河南大学,先为经济系主任,后为教授。此时,北方“非委”成员黎天才、吴雨铭等人已先后进入东北军,成为张学良所倚重的心腹。张学良从潘、黎、吴三位伴读者的讲述中,已对中共工人运动领导者罗章龙的名字不再陌生。此后,张学良向黎天才之妻孙菩缘(普爱)打听罗氏,孙如实相告,使张产生与罗会晤的愿望。就主观思想而言,张初步接触共产主义理论后,萌生会见共产党高层学者的想法。就客观处境来说,张正身陷逆境,谋求打破僵局,亟愿与罗章龙面商对策,寻找出路。据本书作者考察,张罗会晤共有三次:

第一次会晤,1935年4月23日,张学良到开封校阅驻军,随后往访河南大学会见罗章龙。

第二次会晤,1936年4月上中旬,罗章龙以率领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参观访问为名,到西安、华山游览,借机与张学良晤谈。

第三次会晤,1936年夏历7月,罗章龙有西行之举,并遗诗:“晓行原野鹭经过,驰骤风烟渡大河。东望潼头西大散,商鞅前事感人多。”

张罗晤谈内容,本书作者依据罗章龙生前所写的《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》(70年代后期稿,未刊)、《回忆片断——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》(约80年代稿,未刊)等回忆资料,作如下的叙述:

开封会晤,张学良坦率陈述“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,毫不含糊”。张罗“彼此对话范围涉及很广”,谈到了“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,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”。

第二次西安会晤,罗章龙不止一次提到张学良对他的邀请。张学良“介绍东北大学情况,同时又涉及大学学制改革问题,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,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感兴

趣”。张希望罗能“到东北大学讲学,籍便朝夕‘聆教’”。所谓开发西北的真正含义,今天看来另有深意,当为张诚心邀罗共举大事,而非一般意义的延揽人才。西安方面后来正式向罗送上东北大学聘书,罗亦同意于1936年秋后束装西行,卒因身体欠佳未能成行。

1935至1936年间,东北军“非委”成员之间的密谋策划,多以吴雨铭、李希逸穿梭来往于西安开封之间,与罗章龙进行联络。其间,罗章龙与黎天才的一次秘密会晤,则巧妙的安排在1936年夏季的青岛海滨。据罗章龙在《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》一文中写道:

暑假期间往青岛避暑,寓汇泉山东大学,北大旧同学李爱夫妇来访,原来李爱此番来青访文主要是报导东北军方面同志工作情况。

李爱,是黎天才孙菩缘夫妇二人姓名的隐写,文,则是罗章龙别号文虎之略称。据罗回忆,会见时黎天才所谈要点是“汉卿为人通达事理,近来倾向革命,主张打破现状,亟思冲决罗网,为革命出力,察其为人,可与共事。他现有精兵三十万,武器精良,训练良好,久戍思归,梦寐不忘北大营,但不知计将安出”。(罗章龙《大革命时期中共学运工作纪略》)罗章龙的意见是“宜从政治思想、组织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功夫,方能水到渠成”。“事宜迅速以赴事机,同时应计策万全以防内奸,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们,选定一个大题目,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”。(罗章龙《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》)看来,罗黎青岛会晤,乃东北军中前共产党人谋划西北大局的一步要棋。虽然细节隐去,还是可以看出大略来。

西京兵变方案及其意义

1935年秋天,东北军开始移师西驻,张学良出任西北地区“剿

总“副总司令”。“非委”成员立足西北,策划未来行动计划。1936年4月到秋天,罗章龙两次西行期间,均与东北军中的“非委”全体人员见面,对当前时局交换意见。经长时间反复磋商,初步拟定两项计划:

其一为兵变方案: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,自力更生实行兵变,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,并以武力逮捕元凶,迫其就范。兵变完成后,即通电全国讨贼,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,对内实行民主政治,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,出兵抗日,收复东北失地。

第二步为建设方案,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,利用关中、汉中、河西、成都殷庶人力物力,实行改革内政,发展经济文化,达成富国强兵,经济自给自足,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,如此进可以战,退可以守。(罗章龙《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》)

这是一个既有近期行动又有远景设计的方案。张学良何时接受这一方案?本书作者认为在1936年4月下旬,而非在此之前。4月9日深夜到10日凌晨,张学良与周恩来会谈于延安。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详报会谈情况,指出张学良虽然防范蒋介石,但尚无反蒋迹象,张明确表示“现在反蒋做不到”。4月26日,张学良与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谈话时,态度大变。刘鼎从4月27日到5月2日,先后三次向中共中央密报张的惊人变化:“只要有半年功夫,大事可济。我要干就彻底干!”迁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”。到了6月,张学良甚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(见张闻天7月2日给王明、康生、陈云的电报)。8月9日,中共中央致张信,竟称张为“同志”。这与黎天才与罗章龙在青岛会晤时所谈张“近来倾向革命”情形完全一致。这个惊人变化,显然同4月10日以后罗章龙进入西安与张学良会晤,并同东北军“非委”成员共商大计有

密切关系。

当然,如作者指出的那样,前共产党人的兵变计划,不完全是后来发生的捉蒋兵谏。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,但直至11月底,并未决定要采取捉蒋行动。依然把西北大发动的时间延至一两个月后,并告知中共方面,让处境十分艰难,准备二次长征的中共红军再坚持一两个月,则西北之联军可成。紧接着,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督促剿共,透出调换将帅的部署,镇压学生抗日运动,诸多因素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捉蒋行动。张学良下定捉蒋决心后,黎天才知晓这一变化,派孙菩缘返山东“探亲”途中将此消息秘密通报罗章龙。罗回忆说:“十二月上旬,普爱密筒报道:‘众意已决,立即付诸行动!’越二日而兵变爆发!”(见《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》)能否认为:西安事变爆发前夕,“局外”得知消息而静候发动者,天下独罗章龙一人耶?延至12月25日,张学良送蒋介石返京,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,这些前共产党人必然预见到大势已去,几年的惨淡经营蓄势待发,如今悄然划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,标志着东北军“非委”秘密组织从此终结。这些前共产党人,作为张学良幕中的僚属,不可能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。诚如本书所论:即使是张学良,“虽有惊天动地之举,在中国的政治棋盘中,也不过是一粒受人拿捏的棋子”。“少帅本来是把最大的希望寄托于苏联的,而事实上却成了被所有人弃置的卒子”。“然而,毕竟还有人记挂着他是‘千古功臣’,而那些当年出没在他身边的同样有功的智囊,却多是身名俱灭,几乎无人记取了”。(本书第115—116页)吴雨铭1949年入狱,1959年死于江西第一监狱;黎天才1955年因潘汉年案株连入狱,判无期徒刑,1961年瘐死狱中;李希逸流亡美国,1996年悄然去世。

本书结语最后一段话说:

我们想说的只是,在丙子年间的长安风云中,有这么几个不该被遗忘的人,也做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,他们曾经是共产党人。(本书第117页)

这个评价,似乎有些含混。这些前共产党人给予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,是导致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。他们的作为,有助于中华民族,有助于抗日战争,也有功于当时势单力孤深陷泥潭几乎没顶的中共日后的复兴,进而导致江山易主。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,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。

本书也有可议之处。第一,本书除引言、结语外,将论人、叙事分成2块9篇,论人者5篇,叙事者4篇,围绕同一中心,各篇之间多有重复雷同文字,读来不无累赘之感。第二,文字有疏漏,如结语叙及斯大林“一石三鸟”策略时,说“斯君之话深深地刺伤了张学良”。读书至此,到处寻找“斯君之话”,然而到底也没有找到。这个疏漏,是不算小的。

“非委”的话题所引出的质疑,一定不少。作者目前仍在继续探索这些问题,我期待着并且相信他们会有更新的成果问世。

(作者陈铁健,1934年生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:李仲明)